

文 艺 学 与 美 学 丛 书

影视文化前沿

——“转型期”大众审美文化透视

*Forland of Film
& TV Art*

胡智锋●主编

上

53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文 艺 学 与 美 学 从 书

影视文化前沿

—— "转型期"大众审美文化透视

*Forland of Film
& TV Art*

胡智锋◎主编

上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丛书顾问:

刘继南 苏志武

编委会主任:

蒲震元 张 晶

编委:

张 晶 苗 棣 胡智锋 蒲震元

蔡 翔 闵惠泉 张树庭 周 涌

陈友军 王 昕 张国涛

丛书主编:

胡智锋 苗 棣

前言

以影视文化为主体内容的大众审美文化在中国社会文化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在多元化的话语形态中，“转型期”且跨入“后 WTO 时代”的中国影视文化要坚持什么样的审美取向，要确立什么样的价值立场，或者说在当下的实践中，倡导了什么样的审美取向，确立了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并用何种话语方式进行表达，阐发什么样的理论观点与见解，都是业界、学界乃至社会所关注的。为此，我们拟将近几年最具代表性的影视文化学者和他们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加以梳理，力求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在宏观上观照出“转型期”中国影视文化和大众审美文化在审美取向和价值立场上的变迁，在中国社会文化多元话语状态下的冲突与共谋、对话与交流，在全球化和中国加入 WTO 的背景下新的道路选择与新的发展际遇。这是本书成书的主要动因。

本书分上、下两册，共包括五个部分，上册由影视文化研究和电影文化研究两个部分构成，下册则由电视文化研究、电视剧研究和纪录片研究三个部分构成。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一流的专业影视高等教育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来自于中国文联、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国内一流的研究机构和制作机构。收入的这些研究成果有的已经发表，并获得了广泛的反响；有的是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问题、新现象、新发展、新实践修改而成的；还有的则是刚刚结稿的佳作。这些研究成果形式多样，大部分为长篇论

文,也有专家访谈,还有序言、报告等。

在影视文化综合研究方面,黄会林教授的《中国影视美学建设刍议》是为“中国影视美学丛书”作的总序,文中提出了建设影视艺术的“中国学派”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影视美学建设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与思考。仲呈祥教授与周月亮教授的对话是两人在2002年《中国电视》连载的“银屏对话录”的部分节选,文中主要针对影视艺术的批评标准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对观赏性标准问题展开了批判与探讨。胡智锋教授总结了“转型期”中国影视文化建设的四个浪潮:娱乐化、纪实主义、新英雄主义、平民化,全面梳理了中国影视在传播理念、价值取向上的新现象与新趋势。彭吉象教授则将中华民族影视艺术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下,论述了影视的国际化传播、民族文化的国际化生存、传统文化的民族语言表达等重大命题。孟建教授则对影视文化为主导的视觉文化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阐释,并对视觉文化作为一种新文化形态的学科背景、社会动因和传播理念、传播机制进行了理论构建。宋家玲教授重点论述了影视审美心理的特征与“转型期”影视审美心理的变化。陈旭光副教授则对处于持续的变动和转型之中的审美文化走向、艺术家主体精神、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的话语方式和存在方式与表征作了全面的梳理。

在电影文化方面,周星教授从创造性想像力和人性情感的角度,对“转型期”的中国电影艺术文化现象作出了全面分析,得出了耳目一新的结论。黄式宪教授的文章紧扣电影事业(产业)发展的脉搏,将全球化潮流与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取向问题置于“后WTO时期”的时代背景中,对中国电影生存境遇及其前景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其中向市场转型、与资本结盟的结论为中国电影的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观点。王志敏教授则对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电影的新收获作了别开生面的梳理与盘点。丁亚平研究员的文章则将20世纪的中国电影与通俗文化传统相结合,从历史的角度重点论述了通俗文化传统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与渗透。贾磊磊研究员则

将研究目光关注在数字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提出并论述了数字电影与虚拟美学、观众心理等重要命题，总结了中国的数字电影的历史，并对数字化的误区与陷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电视文化方面，高鑫教授对中国电视文化理念的嬗变和趋向作出了自己的梳理，从电视传播的多个角度全面展示了中国电视事业大发展尤其在理念层面上大变迁的全景景观。张晶教授与博士生周雪梅的文章将当代中国电视的价值取向，放在娱乐与审美这一对悖反的理论命题中间，深入探讨了电视的审美化生存的策略问题。俞虹教授把对电视传播价值取向的研究与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变迁结合起来，揭示出电视传播与社会发展紧密互动的格局。欧阳宏生教授聚焦电视批评，从审美的角度指出电视批评是电视审美的反应与共鸣，颇有新意与创见。姜依文高级编辑对电视传播的人文精神做了全面的梳理，总结出电视传播人文精神的民族性、时代性、批判性、技术性四个特点。

在电视剧研究方面，尹鸿教授与曾庆瑞教授在中国电视剧定位、功能、身份、策略等方面的商榷和争鸣，彰显出他们从不同的立场、视角对中国影视文化与大众审美文化的充分关注。张凤铸教授以电视剧的社会效益为考察标准，以详尽丰富的资料和数字概括出“转型期”中国电视剧发展历程中八次轰动效应。王伟国教授则从审美的角度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主旋律电视剧作了高屋建瓴的分析，总结了主旋律电视剧创作中的经验与教训，并对电视批评提出了希望。曾田力教授专注于音乐的研究，其文章对影视剧音乐的文化价值取向作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在纪录片方面，张同道教授与李亦中教授对中国纪录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跨世纪的梳理，展示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嬗变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以中国影视文化为主体内容的大众审美文化已经处在了学理研究的视域之内，他们有的采用了全球化的视角，有的秉持着本土化的立场，有的是美学的批判，有的是历史的探讨，

4 ◇ 影视文化前沿

有的是文本的评析，有的是文化的思考……总之多元的理论话语对以中国影视文化为主体内容的大众审美文化，作出了具有前沿、前瞻意义的判断、分析与阐释，这对未来中国影视文化、中国大众审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都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文献价值与现实意义。

编者

2003年6月



胡智锋 1965年生，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副主编，中国高等院校电影电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个人专著有：《电视美的探寻》、《中国电视观念论》、《影视文化论稿》、《电视美学大纲》等。参与过《中国应用电视学》、《电视艺术美学》、《中国电视论纲》、《中国电视文艺学》等著作的著述。主编过《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等书。发表各类学术论文一百二十余篇。其成果多次获省部级以上奖项。曾赴美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和学术考察。担任“五个一工程”大奖等多项全国性评奖的评委。

文 艺 学 与 美 学 丛 书

第一辑

大众文艺学
艺术之维
审美之思
美学前沿（第一卷）
会通精神
灵魂的震颤
才子文心
艺术符号美学

第二辑

论审美文化
中国古典诗学新论
美学前沿（第二卷）
戏剧影视文艺学
文艺学的走向与阐释
电视美学大纲

第三辑

纪录与诠释：
——电视艺术美学本质
影视文化前沿
——“转型期”大众审美文化透视（上、下）
电视审美文化论
大众文化与审美
——电视艺术论
论通俗文化
——美国电视剧类型分析
影像记忆
——当代影视文化现象研究
辽金元文学论稿

责任编辑：陈友军
封面设计：武晓强

目 录

前言	/1
黄会林: 中国影视美学建设刍议	/1
仲呈祥 周月亮: 影视艺术的批评标准与观赏性	/18
胡智锋: “转型期”中国影视文化建设的四个浪潮	/46
彭吉象: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民族影视艺术	/65
孟 建: 影视文化的历史转向	
——阐释以影视为主导的视觉文化	/78
宋家玲: 影视艺术审美心理的特性	
——兼论我国“转型期”影视审美心理的变化	/99
陈旭光: 世纪之交的文化艺术转型: 趋势与表征	/116
周 星: “转型期”中国电影艺术文化现象分析	/136
黄式宪: 全球化潮流与中国本土电影的文化选择	
——对于“后 WTO 时期”中国电影生存境遇及其 前景的几点思考	/150
王志敏: 新世纪的起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新收获	/186
丁亚平: 20 世纪中国电影与通俗文化传统	/196
贾磊磊: 中国电影的数字化生存	/223

中国影视美学建设刍议

黄会林

近

年来，我们集中主要的精力从事于“中国影视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以图为建设蕴涵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影视美学”奉献绵薄之力。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题呢？其原因在于：

第一，电影电视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传媒中传播最广最快，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传播方式之一。影视艺术以其视听综合、时空综合、艺术与技术综合的绝对优势

黄会林，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此文为黄会林教授为“中国影视美学”丛书所作的总序。

而引人注目，被誉为最年轻也最富于潜力的人类“第七艺术”。它的发展取向和层次直接关系着社会的进步。世界影视发展史表明，高质量的、民族风格浓郁的影视艺术作品对于增强本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思想文化影响力度、塑造本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美好形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部分影视作品，由于思想不够健康，制作十分粗糙，甚至格调低下，已经产生了相当广泛的不良作用，有些事实甚至是触目惊心的。

正是基于影视作品所具有的非凡影响力，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形成了国际间的激烈竞争。例如：美国以其影视制品的输出，企图占领与征服欧洲乃至世界文化市场，受到相关国家的强烈抵制而四处碰壁。1993年，美国曾在“世界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强烈要求“欧共体”放开影视文化贸易，实行“自由出入”，受到更为强烈的抵制。法国文化部长撰文：“如果我们同意把文化商品也列入关贸总协议谈判范围之内，不出10年，我们欧洲的所有电影和电视节目都将成为美国或日本原装货或改写本。”法国著名演员在电视中说：“现在已经到了要么让美国文化和电影全部占领西欧，要么发挥法国人的创造性的时候了。”据统计，当时在法国影院中美国影片的票房占60%，而法国影片仅占美国电影市场的0.5%；美国电影在德国市场仅1993上半年已占据86%的票房。1993年9月，欧洲4400位影视名人联合呼吁“欧共体”保护12国影视业免受好莱坞的强大冲击：“美国电影公司的目标是完全征服实际已基本控制的电影市场，从而扼杀欧洲影视业一切创造性努力。”他们积极主张保护、扶持本国文化，以免西欧人淹没在美国文化的汪洋大海里。最终，事情未能如美国之愿而使之耿耿于怀。到了1995年，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文化娱乐产品的输出受到来自欧洲和北美邻国的双重打击。欧洲联盟决定，加强对欧盟成员国进口美国好莱坞影视制品实行的限额制。加拿大广播公司宣布，禁止把美国电视节目安排在黄金时间播放，不惜为此每年损失1200万加元。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文化的大举入侵，会使

加拿大失去自己的特色；担心美国文化的消极面，造成加拿大年轻一代的颓废堕落。他们说，抵制美国文化产品“既是一个商业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国家文化之根的问题”。美国本土的有识之士，也非常注意传播媒介困扰美国社会的严重问题，一再提醒人们，电视可能给儿童带来不良影响。他们为此进行研究，发现美国18岁的青年平均在电视上看到的谋杀情节多达18000个，这些暴力镜头导致了社会上暴力行为的增多。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年内两次对好莱坞人士谈话：“电视电影工作者对民众怎样看将来，具有很大影响力。他们要给民众值得尊敬的东西，摒除没有意义的性与暴力，这些已对美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造成了很大的副作用。我要问，好莱坞为什么仅止于提供娱乐而不能提升灵魂？传统上，艺术家是提升人性，而不是降低生活本质。美国是世界上暴力最多的先进国家，坐牢人数也最多，这些都是需要面对的，因此我要求从业者自律。”他要求好莱坞能自发地减少暴力片，因为“这些情节会给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他希望得到大家协助，将“一代人从危险的边缘上拉回来”。

中国电影自1905年诞生，拍出戏曲片《定军山》，至今已历经90余年之奋斗，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辉煌的世纪之路。特别是中国电视，自1958年起步创业，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已拥有经国家、政府有关部门正式批准成立的无线、有线、教育电视台达3300家有余，约为美国电视台的3倍、日本的25倍、英国的260倍；电视机销售量超过3亿台，其观众覆盖面达10亿人以上，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电视第一大国。中国的电视新闻节目、综艺节目、电视剧、专题片、纪录片等等，确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大众重要的信息传播和娱乐形式。从呀呀学语的幼儿，到耄耋之年的老人，都与电视结伴而行，电视成为人们日常不可缺少的消费品之一。这个庞大的存在，将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关系着青少年的成长，对他们的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精神状态、道德品质

的培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极大地提高影视制作的生产力，以高质量、高品位、高格调的影视作品进入每个家庭，覆盖中华大地，进而叩响世界文化大门，将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潮流之中。实践证明，影视作品越是普及、深入，就越有可能成为一种可怕的双刃剑。众所周知，我国的电影电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塑造中华民族未来的精神面貌，也将产生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影响。然而也毋庸讳言，一些劣质的、扭曲的、不健康的影视作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十分可怕的、非常严重的。在一项由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所做的调查中，对北京 440 所中学的学生抽样提问：“获取社会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几乎一半人把电视排在第一位；而把老师排在第一位的仅占 7.3%。北京四中数十名高中学生给报社编辑写信说，他们被北京有线电视台播出的香港连续剧《碧血青天杨家将》和台湾连续剧《七侠五义》深深吸引，迫切地恳求在报上介绍两剧中大侠展昭的扮演者。《中国青年报》载文《可怕的盲目摹仿——青少年“电视病”扫描》，其中除去描绘生活中的孩子们动辄“味道好极了！”和“嗨嗨”有声地追逐打闹、冲拳踢腿，摹仿着电视里的言行举止外，特别指出了影响着少年儿童思想和行为向不健康的方面发展之“电视病”症状，最严重者当首推“盲目摹仿”。并列举出“摹仿练功”使一个三年级小学生为学武打片的侠客，持刀从 3 米墙头纵身跳下而死亡；“摹仿自杀”使一个 6 岁男童试图扮演电视剧《聊斋》的鬼相而仿效上吊身亡；“摹仿敲诈”使一个 10 岁女孩仿照宣扬暴力的电视片写信向邻居敲诈巨款；“摹仿抢劫”使一个 14 岁学生用石头把同学砸伤而致昏死，自供是看了录像片《赌神》学来的；“摹仿杀人”使几个六七岁小孩学着电视剧《铡美案》，酿成一出“小包公”怒铡“小陈世美”的悲剧；“摹仿强奸”使一个 13 岁的男生仿照外国电视剧中的作案手段，在 12 天里强奸了 3 名幼女……社会舆论一再呼吁：为保护我国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荧屏银幕务必“除暴”。当今，在影视领域，实践先行、理论滞后的现象，

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影视理论基本上来自西方或前苏联。对比着中国电影电视实践成果之经验与教训都已相当丰富的现实,理应借鉴、吸收国外影视理论优秀成果,尽早建立起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与中国文化相匹配的、能够有效地指导中国影视实践的影视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严峻任务未得解决,从而制约着中国影视的健康发展。

第二,中国影视发展的历史表明,影视虽然属于典型的舶来品,但是,中国影视并不是欧美影视的翻译版,而是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因为,影视不仅仅是科技工业,也是美学与艺术,科技手段固然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然而美学与艺术却有着明确的民族性格。换句话说,尽管影视艺术是国际性的,影视理论中的本体论部分也有着通行的认知意义,但影视理论中的功能论部分却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因为影视艺术每一种功能的发生,都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土壤。因此,影视艺术输入中国的历史,也是它逐步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影视能否在世界上拥有它应当具有的地位,关键在于中国影视是否生成了具有民族特征的艺术风格。

应该说,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影视艺术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其中的核心问题正是中国影视艺术的民族特征。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再到80年代、9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富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优秀影视作品。代代相传的电影名片如《神女》、《渔光曲》、《桃李劫》、《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小城之春》、《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丽人行》……如《南征北战》、《祝福》、《家》、《林家铺子》、《青春之歌》、《聂耳》、《林则徐》、《甲午风云》、《早春二月》、《红色娘子军》、《李双双》、《上甘岭》……《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喜盈门》、《城南旧事》、《骆驼祥子》、《人到中年》、《黄土地》、《黑炮事件》、《青春祭》、《芙蓉镇》、《老井》、《红高粱》、《开国大典》……反响强烈、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如《凡人小事》、《蹉跎岁月》、《高山下的花环》、《今夜有暴风

雪》、《新闻启示录》、《四世同堂》、《红楼梦》、《努尔哈赤》、《雪野》、《凯旋在子夜》、《希波克拉底誓言》、《西游记》、《严凤英》、《秋白之死》、《末代皇帝》、《篱笆·女人和狗》、《渴望》、《围城》、《南行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不胜枚举。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创作的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影视作品，从数量到质量不在少数，经得起世界性的比较。外国电影家在看到中国30年代的默片《春蚕》后，曾惊呼：原来新现实主义早已在中国！中国的经典名片《早春二月》的导演谢铁骊也曾特别谈到，影片是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美学影响下产生的，他被原作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中国南方的特有风情深深打动了。在中国新时期电影中，中国美学传统同样发挥着它的独特作用。如谢晋导演在《天云山传奇》中的一个著名场面：女主人公冯晴岚在风雪弥漫中，用板车拉着病重的罗群，在冰天雪地间渐行渐远的瘦小身影……那分明是苏东坡特有的意境：“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其萧瑟惆怅之意，尽在不言中。通篇整体的精心营构，使这部洋溢着民族文化氛围的作品，列入了中国电影精品画廊。自然，不容否认的是，确实也有不少影视创作生搬硬套西方影视模式，缺乏民族特性，而它们往往属于不被广大中国观众接受，也不为广大外国观众欢迎的作品。

现在我们要问：既然我们有如此丰富的文化传统可以继承，我们的民族美学与民族文化，可以对电影电视艺术产生深刻的、良好的影响，为什么不能得到大力发扬？为什么不能使我们的民族电影在国际影坛占据应有的地位？这也许要归咎于我国影视理论研究的重大欠缺。在世界电影发展中，理论研究颇具规模，并且直接影响着电影的创作和各种流派风格。而在我国，影视理论与评论常有急功近利、盲目迎合，以及种种西化现象——不管中国文化的特点怎样，不论民族传统的继承如何，只要是流行的就是合用的，只要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由此而造成影视理论和评论脱离社会和观众的需要，反复地炒冷饭；也使影视这个最富影响力的大众传媒渐渐

不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影视文化的主体精神尚未确立，这一深层的文化困惑，已经造成了目前影视文化面临的某些实践难点。影视美学中国文化特征模糊的现状，导致了影视理论的严重滞后；而影视理论的滞后，就必然限制了中国影视实践的健康发展。一个不善于研究和总结本土艺术与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不能很好地吸收其他民族的艺术及文化经验，因为它缺少立足的根基。因此，坚持民族文化精华和传统美学的熏陶，保证电影电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的最有力媒介，实在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第三，目前，由于卫星电视、互联网络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正在加速。但也应看到另一种潜在危机，如上所述，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日益受到来自西方影视文化的包围与侵蚀，一场以文化为武器，以影视为媒介的新的殖民运动正在悄悄展开。亚洲，尤其是中国，被西方称之为影视文化竞争“最后的疆场”。他们极力向中国倾销其影视产品，其中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青少年成长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在影视艺术文化领域制订出民族文化的应对策略，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向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寻求滋养，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影视文化主体，将是中国影视今后的发展轨迹。如何在未来的信息竞争和文化传播领域里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应当成为我们特别关注的命题。

中华民族几千年持续发展的文明传统，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从“有无相生”注重整体功能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和谐观等文化观念，到具体的审美方式，都有着大量可供汲取的民族智慧的精华。作为这一文化的承袭者，我们应该担当起传递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张岱年先生在《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一文中指出：“从世界思想、世界文化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中国文化思想主流中贯穿的这种超越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互主体性观念，代表了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近现代思想的新型的主体性观